肺腑若能言，医生面如土

——对加加美光行教授倡言的一点回应——

张　琢

（爱知大学）

多年来加加美先生独树一帜，殚精竭虑，致力于现代中国学的构建。进而又从现实的中国政治研究，回溯国际汉学－中国学的学术史，尤其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研究，清晰地梳理出了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机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和思想倾向变迁的脉络，并且从方法论上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导引出现代中国学研究的新范式。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对“东方主义”的清算和对现代中国学研究的“共同态度性”的提倡。

加加美先生在报告中提出了作为别国学的地域研究的“共同态度性”新范式建构的三个前提，思考得很深，我都赞同。但因时间所限，我在这里仅能就其中的第一个前提做点回应。

加加美先生在此及过去所再三强调的这个新范式的首要前提，就是在“国别学”研究中，必须承认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的各类主体及其主体性，並与作为外国人的“国别学”研究者的主体性处于同等位置，但各方都持有自己的“目的性态度”（价值判断与行为方式）。这即是多年来在现代中国学研究中加加美先生所身体力行的、我自己参与其中的共同主体组合——如果自己对号入座，我们俩就正是他所说的那对“映照彼此的镜子”。这方法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形成互补、互动的机制，帮助克服因种种原因造成的认识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使认识更客观、更全面、更深刻，并在切磋中不断提高双方的认识能力。这也正是救正“东方主义”弊端的良方。

现在随着东方的复兴，东西方发展的天平日趋平衡。信息化的发展推动全球化加速。各地域、各国、各民族的人员、文化和学术的交流日益频繁、深入。冷战思维与意识形态的成见渐渐消退。这些相互关联的因素，正是孕育、催生加加美先生致力构建的这种平等合作研究的新范式的前提条件和动力。

所以，我不仅肯定这种新范式是可取的，而且认为是可行的——实际上也已经大行其道。

“肺腑若能言，医生面如土。” 东方的肺腑直抒胸臆之日，便是“东方主义”的郎中退休之时——当然，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现在才上路不久，往后还需要我们继续共同努力去实现。